

浅介严复“信达雅”理论 及其对翻译史的影响

■潘昊宇

摘要: 严复的“信达雅”翻译理论对中国翻译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,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。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超越了中国近现代其他翻译理论,堪称一绝。“信达雅”理论的发展历经了严复的不懈努力,从传统到创新,一路走来,从未停止。“信达雅”理论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变化,它不仅拥有更多的内涵,而且也拥有了更多的创造性和活力。这篇文章将深入研究“信达雅”的翻译理论,并对严复的“信达雅”理论的发展、传承和发挥作用进行分析。

关键词: 严复 “信达雅”理论 中国翻译史

一、“信达雅”理论的起源

从周朝开始,我国的翻译史就有了文字记载。《礼记》指出:“五方之民,言语不通,嗜欲不同。达其志,通其欲,东方曰寄,南方曰象,西方曰狄鞮,北方曰译。”在西汉之前,翻译并不常见。随着张骞出使西域,开启了中外交流的纽带,也将翻译这个活动传入了华夏大地。翻译家们将“译”这一术语改造,发展出了“翻译”这一新术语,并一直延续至今。翻译史上有3个关键的转折点,它们促进了翻译理论与实践的飞速进步。

第一阶段为东汉至宋代,以对古印欧语的翻译为主。汉武帝在位以后,开通西域,成了一项重要国策,从而为古印欧语进入华夏开辟了道路。此后,形成了长达千余年的灿烂翻译事业,至隋唐时期臻于顶峰。在这一时期,翻译理论的主要表现形式是对古印欧语的翻译,翻译大师们提出了多种不同的观点,如直译派、意译派等,融合派也有很多见解,但是从总体上看,还没有形成一个完整的认识体系。

第二个阶段为明末清初时期的西学翻译。在北宋初期,虽然还有一些翻译工作,但由于宋元时期中原地区的战争和混乱,社会变得越来越动荡,翻译工作逐渐式微。翻译活动重新兴起,是在明朝永乐年间。那时候,出于对外交往的需要,创建了四夷馆,培养翻译人才。至明代晚期,伴随西方国家地理大发现,西学东渐,翻译工作比较积极。然而,这一时期翻译的方向发生了重大变化,欧洲天文学、几何学、医学和其他学科的翻译史,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。一些翻译家对翻译工作提出了自己的见解,意大利利玛窦曾认为,东西方之间的语言结构差异很

大,在字义上也存在着许多不同之处。中西方语言结构存在显著差异,导致文章的表达方式也不尽相同。中国的一些名词在西方并不常见,但通过口头解释尚可以理解,而翻译成文字可能会让人难懂。

第三个阶段为清朝末年的西学翻译。这一时期,中国有识之士都觉得,向西方学习是十分必要的,因此,翻译活动又大兴起来了。严复是一位毕生致力于西方社会科学翻译工作的学者,他在《天演论》序中提出了翻译的三难原则:信难、达难和雅难,这标志着信达雅翻译理论,已经成为中国近现代最具影响力的翻译理论之一,并在传承和创新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。

二、严复介绍及其“信达雅”理论的演进

严复(1853—1921),我国现代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和翻译家,在中国思想史上,最早系统地引进西方学术的启蒙思想家。少年时,严复进入故乡船政学堂读书,受到大量自然科学教育。1877—1879年,严复被派往英国,先在普茨茅斯大学学习,后来又进入格林威治海军学院深造,以获得更深厚的知识和技能。严复在求学期间对英国社会和政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,他深入研究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学术理论,并且极力推崇达尔文的进化论思想。严复回国后,从海军界转向思想界,积极推动西方文化的发展,并完成了《天演论》的汉译。这部译作与赫胥黎的原作有很大的差异,并且与斯宾塞的普遍进化理论也存在一定的不同。《天演论》是严复的代表作,他运用“物竞天择”“适者生存”等生物进化理论,提出了拯救国家的理念,倡导人们振奋精神,激发智慧,培养良好的道德,努力实现国家的复兴。

长久以来,而洋务派则是封建地主阶级的杰出代表,他们在“中学是体,西学是用”的指引下,积极推动洋务运动。甲午海战的失利标志着洋务运动的失败。甲午海战的失败让许多有见地的人意识到,“中学是体,西学是用”的洋务派的改革无异于一场灾难,他们便改变了原本的观念,积极推动改革,引入西方的民主思想,激发人们的创新精神,同时也开始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。

“译事三难,信达雅难”这句话,由严复撰写,深刻揭示《天演论》的精髓,为翻译界带来了一个具有深远影响的新标准。他的成功在于将西方的最前沿的理论融入“新学”,从而使近代的翻译学理论得以发展和完善。

《译例言》中,严复明确指出“信者,达也,雅者也”为译界的标准,并且进行了详尽的阐述。第一个字“信”的含义为要求译文忠实于原文,并且指出翻译忠实于原文具有很大的难度。若不能达到忠实于原文的要求,即使翻译了也相当于没有翻译。因此,在词句之间,应当灵活运用,不要过分拘泥于字数和句子顺序;由于原文的语言深奥难以用语言来比喻,因此我们需要通过前后的对比来表达其含义。用这样忠实于译文的原则去翻译,译文就能显得通顺易懂;译文通顺易懂,就是忠实于原文了。这表明了“信”与“达”之间的密切联系。信达而外,求其尔雅,以达到最佳效果。这不仅是一种远见卓识,而且更是一种深刻的思想。达到“雅”的境界,也就成了“达”的意义。

很显然,严复翻译标准下,“信达雅”三原则为一有机整体。所谓“信”,就是要忠实于原文,所谓“达”,就是对读者忠实,所谓“雅”,就是对文学语言忠贞,三者反映作品,反映读者、语言三方面的相互关系。“信”是最重要的,但如果只是“信”而没有“达”,就意味着不“信”,达到了“达”才能够“信”。追求“达”,翻译应该“求其尔雅”。因此,“雅”既是为“达”而存在的,也就达到了“信”的境界。

“信达雅”的出现,为中国现代翻译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崭新的视角,促进了我国翻译界的进步。“五四”新文化运动的出现标志着开启了一个全新的白话翻译时代。随着时代的发展,译者的数量急剧增长,思维自由和文化自由,使得翻译的领域和内容变得更广泛,从传统的翻译著作,扩展至西方哲学、文学理论、戏剧、散文、诗歌等各种形式。这也对翻译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。通过对信达雅的研究,我们可以逐步深入地理解翻译界的相关

标准。在20世纪30年代初,鲁迅和瞿秋白在交流中强调了严复的翻译标准,他们指出,翻译的重要性在于它能够将原文转化成具有表达性的文本,从而实现“信”与“达”的辩证统一。“翻译的原则总不外乎以信”是艾思奇在《论翻译》一书中提到的。朱光潜认为,文学翻译的核心是“信”,而“达”与“雅”则是基于这一理念而建立起来的。尽管绝对的“信”是做不到的,但翻译仍然应尽量接近原文。还有人对信达雅理论作了全新的发展说明。例如林语堂在《论翻译》一文中说,评价译文有三重标准,即忠实、通顺和优美,也就是译文既要原文忠实,对读者和艺术也要忠实。

翻译人员的个人经历会影响他们使用何种方式、态度和立场来再现原文。严复和其他翻译家根据原文和自身经历,将西方社会经济作品翻译成中文,并在译文中进行了增删和注解。这些翻译都受到了严复直接和间接的经验影响。所以对一名译者而言,掌握了基础语言知识,自然就远远不够了,要不断地丰富我们的阅历,关注日常生活细节。

三、“信达雅”理论继承与拓展

“信达雅”理论导致了关于翻译标准问题的探讨不断向前推进。其中,对翻译界颇有影响的理论有傅雷“传神说”,钱钟书“化境说”等,在信达雅理论上取得突破性进展,将信达雅理论从文艺美学边缘置于文艺美学范围之内,继而走向艺术的极致。傅雷曾经指出,翻译应当像绘画一样,不仅要求形似,更要求神似,以达到最佳效果。换句话说,翻译应该是一种精神上的表达,它要求我们从字面上理解原文的意思,并将其中的含义发挥出来。严复对于曾经提过“达旨”这个概念,“传神”的出现大大超越了“达旨”,它不仅将传统美学纳入翻译,而且还为翻译理论的研究带来了新的思路,使得翻译理论的深入研究得以更加深入。傅雷在之后又指出,应尽可能地保持原文的句法结构。傅雷重申了对严复所提出的对“信”的重视,以此来强调其重要性。而钱钟书老师在翻译中提出“化境”一词。“化境”本来是外来术语,它蕴含着深刻的哲理,而钱钟书老师认为,在文学翻译过程中,应该尽量保持原作品的韵味,而不是把它们简单地复制,以达到艺术上的完美,这也是他认为文学翻译的最高标准——“化”。“化境”比“神似”更具有深度和广度,更能满足读者的需求。与其说它是一种标准,不如说它是一种对文学翻译精益求精的追求。

从上面可以看出,“神似”就是一种突破,“化境”即上升。虽然整体仍属于信达雅范围,但这是“信达雅”研究的进一步延伸和发掘。如“雅”,已探步美学之边,前进的步伐是“神似”的说法,又是前进的脚步,是为“化境”之谓。就此而言,不论“神似”或“化境”,都绝没有否认信达雅的存在,而是对其进一步升华罢了。

四、结语

通过综合分析可知,“信达雅”三个字,可以说是中国译界的一条重要规律。所谓“信”,就是忠于原文的作者与读者群体,将原文的内涵和含义传递给读者;所谓“达”,就是要让译文通顺易理解,与目的语的诗学观念相一致;“雅”,就是译文符合美感,与目的语读者群的审美理念相一致。三者是相互关联的,以“信”和“达者,高雅也”为中心,具有深远的意义,具有旺盛的生命力。其一,由于“信达雅”翻译标准较为完善,总结出翻译工作中的主要特征,注明翻译工作要求。翻译的关键在于保持原文的精髓,使用恰当的语言表达思想,并赋予语言以美的外观。“信达雅”可以作为其总结。因此,我们必须对其他翻译标准和要求进行更多的改进,以满足这些需求。其二是因为信达雅翻译标准,具有较强的包容性与开放性。信达雅的翻译标准在历经百余年之后,人们对它的认识和掌握已不囿于本义。随着翻译技术的飞速发展和研究的不断深入,人们越来越发现信达雅翻译标准具有极强的包容性和开放性,甚至可以将“神似”和“化境”的内容视为“信达雅”的延伸。由此可见,“信达雅”自问世以来,便有了这样的特质,故其经久不衰。

在当前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,东西方文化之间的关系不断变化着。一方面,新的理念和形态不断出现构成

冲突,另一方面走向互补,取长补短。对于翻译理论,国外的翻译理论虽然多种多样,研究透彻,但这并不能代表国内的翻译界没有话语权。我们必须善于挖掘国内传统翻译理论,对以“信达雅”作为其理论中心的国内传统翻译理论进行革新,使其不断丰富和完善并保持生机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冯立新.论严复“信,达,雅”翻译思想[J].华南农业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05(2).
- [2] 高晓鹏.严复翻译标准——“信达雅”再思考[J].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,2017(4).
- [3] 何冰.译界泰斗——严复[J].兰台世界,2012(4).
- [4] 廖七一.严复翻译批评的再思考[J].外语教学,2016(2).
- [5] 马志媛.“信达雅”在中国翻译史上的重要地位及影响[J].延安大学学报(社会科学版),2012(3).
- [6] 钱钟书.林纾的翻译[J].中国翻译,1985(11).
- [7] 沈苏儒.论信达雅:严复翻译理论研究[M].北京:商务印书馆,1998.
- [8] 严复,冯君豪.天演论[M].郑州:中州古籍出版社,1998.
- [9] 张宜坤,李永兰.基于“信达雅”的民国翻译观分析[J].产业与科技论坛,2021(10).

(作者单位:湖南工业大学)

作者简介:潘昊宇(1994-),男,汉族,湖南岳阳人,研究生在读,湖南工业大学,研究方向:英语笔译。